

什麼是「臺大精神」？

On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特聘講座教授

Member, Academia Europaea

歐洲研究院院士

2F.-2, No. 88, Sec. 3, Xincheng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Email: chun_chieh_huang@hotmail.com

DOI:10.6360/TJGE.202312_(32).0001

收稿日期：2023/08/30；修正日期：2023/10/29；接受日期：2023/12/14

摘要

本文採歷史之觀點，從 1945 年臺灣光復後臺大之發展歷程，分析「臺大精神」之發展。所謂「臺大精神」可視為由一組互有關聯的概念包括大學觀、教育觀、經濟觀、政治觀、世界觀等所組成的「概念叢」。「大精神」是在具體歷史脈絡與情境中，臺大與政治力與經濟力的對抗與互動之中所形成，其內涵在於對大學教育主體性之追求，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 對抗政治力之不當干預；(2) 維護教育場域之自主性；(3) 強調教育之內在價值。本文指出：「臺大精神」建立在「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的堅持之上，但是「臺大精神」也受到來自大學外部以及內部的挑戰，維護不易。

21 世紀大學教育的內容快速邁向「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市場化」，國內外大學日益重視有形的、直接的、現在的價值，而輕視不可見的、間接的、未來的價值。本文所謂「臺大精神」雖然只是一種看不見的校園氛圍、一種不能以量化工具加以測度的大學教育價值觀，或是一種很容易被政治力與經濟力扭曲的脆弱的師生共識，但是卻彌足珍貴，亟待細心守護。在「學術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 21 世紀裡，70 幾年來臺大師生所形塑的「臺大精神」如果能夠繼續弘揚，也許就可以擎起華人地區高等教育的火炬。

關鍵字：臺大精神、教育主體性、學術獨立、學術自由

壹、引言

本文寫作之目的，在於對所謂「臺大精神」，提出一種「歷史的解釋」。所謂「歷史的解釋」，就是將臺大放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中，探討自 1945 年二戰結束臺灣光復至今，臺大在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臺大精神」。所謂「臺大精神」可視為由一組互有關聯的概念包括大學觀、教育觀、經濟觀、政治觀、世界觀等所組成的「概念叢」(cluster of ideas)。但是這些抽象的概念，存在於具體的歷史情境與脈絡之中，而不是抽離於歷史情境與脈絡之上。本文聚焦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一、臺灣大學自從 1928 年創校以來的整個發展過程如何？在宏觀的歷史脈絡之下，臺灣大學與「政治力」及「經濟力」如何互動？

二、在光復後臺大與臺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何種「臺大精神」？

本文第二節先將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的創立，置於臺灣史、亞洲史與世界史的脈絡中考量；第三節簡論光復後臺大的發展；第四節分析臺大發展過程中，與政治力及經濟力的互動；第五節進一步解析臺大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所謂「臺大精神」在於教育主體性的追求及其落實。第六節則綜合全文論述，提出結論。

貳、臺大創校的歷史背景

臺灣大學創辦於日本帝國殖民臺灣的 1928 年，正是臺灣歷史風起雲湧的時代。從宏觀的視野來看，臺灣的歷史呈現兩個特徵，可以譬喻為「交響曲」與「羊皮紙」：首先，因為 1895 年乙未割臺之後所造成的臺灣居民的認同感斷裂，臺灣的歷史可以譬喻為一首雜音很多的交響曲，時或管弦嘔啞，琴韻悠揚，時或鐵騎突出，刀槍並鳴，在歷史情境中與時俱進。第二，臺灣歷代的統治者都盡力對前一個統治者所留下的歷史印記加以抹除或賦予新解，使臺灣彷彿是中古歐洲的一張羊皮紙（palimpsest），因為在紙張還沒有發明之前，中古歐洲神職人員在羊皮上面書寫，後來的寫手則用抹布將前者留下的印記擦除之後另再書寫，然而多半擦不乾淨，所以羊皮紙上就累積了一層一層的字跡。臺灣歷代的統治者，都努力於抹除前一個政權所留下來的歷史印記，使臺灣的歷史成為層層相因的一張羊皮紙。

臺灣歷史的轉捩點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 年 9 月 7 日劉公島外的黃海戰役，日本帝國海軍摧毀大清帝國 30 年自強運動所經營的海軍，決定了近

代中國歷史的翻轉，以及東亞的新強權日本帝國之興起。

1928 年臺灣大學創校的 1920 年代，有三個重要的歷史脈絡：第一，1920 年代是臺灣歷史轉型的關鍵十年，最重要的是作為整體而超越此前的「泉州意識」、「漳州意識」、「客家意識」之上的「臺灣人認同意識」的提升，若林正丈指出：

「一九二〇年代以後，出現受近代教育的知識階層，他們開始從事抗日民族運動，自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有兩層重要性。第一，在日本統治下，殖民地支配下的各集團，以共通的價值剝奪感為契機，出現了包含所有臺灣漢族的認同感。第二，這種認同透過抗日民族運動的形式而政治化，最後產生『臺灣人』的認同」¹

在「臺灣人認同」提升的 1920 年代，臺灣人也從武裝抗日運動走向議會鬥爭。臺灣的菁英在 1918 年成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²1920 年《臺灣青年》創刊，臺灣知識分子也組成「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臺灣文化協會曾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開講《論語》，特別針對《論語》中「夷夏之防」大加發揮，批判日本殖民者，引起日本特別高等警察（即思想警察）到場關注。1926 年，文協發生內鬥，分裂為傾向社會主義與傾向資本主義的「左」「右」兩派。1927 年，《臺灣民報》獲准在臺發行，發行之初即針對「中國改造論」展開論辯。右派（資本主義）代表人為陳逢源（1893-1982），代表左派（社會主義）的人物是徐乃昌（1869-1946）、蔡孝乾（1906-1982）。³就在這樣一個思潮激盪

¹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洪金珠、許佩賢譯，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50。參看拙作：Huang, C. C.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 pp. 111-127.

² 六三法賦予臺灣總督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各種特權，1918 年 5 月臺籍知識分子與留日學生組成「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

³ 關於 1920 年代臺灣知識份子的「中國改造論」的論辯，參看拙作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99-

的時代裡，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創校總長是幣原坦（1870-1953），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科，專長為朝鮮史研究。⁴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帝國的第 8 所帝國大學，當時日本國內也有輿論表示臺灣屬於日本帝國的海外殖民地，因此臺北帝國大學之創立並不需要比照日本內地的帝國大學之規範。但是幣原坦堅持，既然名為「帝國大學」，則必須依照《帝國大學令》創辦，因此在創校之初，就決定了臺北帝大成為「研究型大學」的走向，實施德國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模式的大學講座制度。

第二，我們可以再從 1920 年代的亞洲局勢，分析臺北帝國大學創辦時的第 2 個歷史脈絡。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 年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張作霖（1875-1928）宣布東三省自治。1923 年孫中山（1866-1925）就任非常大總統，1924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也就在 1924 年（民國 13 年，大正 13 年）11 月 28 日，孫中山在日本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的重要演講，呼籲新興的日本應做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勿作西方霸道的鷹犬。⁵他的演講由戴天仇（1891-1949）現場口譯為日語。1925 年孫中山逝世，中國經歷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在 1920 年代，中國報紙的數目與其發行人數，是代表從傳統到現代過度的重要指標，而當時中國報紙的種類已經多達 400 種了。1926 年蔣中正（1887-1975）誓師北伐，1928 年臺共成立於上海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同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

臺北帝國大學創立之後，處於日本帝國統治之下，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氛圍也經歷重大的改變，法西斯主義壯大、軍方勢力快速崛起。當時日本國內有

124。

⁴ 幣原坦著有《韓國政爭志》一書。幣原坦：《韓國政爭志》，東京：三省堂，1907。

⁵ 參看拙作：〈孫中山思想及其 21 世紀的新意義與新啓示〉，載於黃俊傑：〈孫中山思想及其 21 世紀的新意義與新啓示〉，《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179-201；Huang, C. C. “Dr. Sun Yat-sen’s Pan-Asianism Revisite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3, 2012, pp. 69-74. www.sciea.org/data-j03/06_Note_Chun-chieh%20Huang.pdf.

一些政界人物反對軍方的軍事冒進，1932年5月15日日本帝國海軍少壯軍人，衝入當時日本首相犬養毅（1855-1932）的官邸（犬養毅是孫中山好友，曾大力資助孫中山革命事業）將其刺殺，震動日本國內，史稱「515事件」。1936年日本發生侵略行動的「北進派」與「南進派」兩派的鬥爭，北進派係以陸軍為主，訴求先控制東三省。南進派則以海軍為主，提出「內南洋」與「外南洋」的概念。1936年2月26日發生「226事件」，兩派青年軍官內鬥，同一天內暗殺了幾個部長，首相僥倖逃過一劫。20世紀日本著名學者丸山真男（1914-1996）指出，1936年的「226」事件代表現代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完成，⁶確實是一針見血之言。

第三，我們可以從臺北帝國大學創立的1920年代的世界史脈絡來看，1922年義大利法西斯政權、蘇聯政權成立，1921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成為納粹黨領袖，1924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去世，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上臺。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接著發生世界經濟大蕭條。臺北帝國大學就創立於這樣一個世界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代。

創校之初，臺北帝國大學創辦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全校教授共22名。至1936年設立醫學部。臺北帝大因為招生狀況欠佳，於是在1941年設立臺北帝國大學預科，以確保穩定的學生來源。當時的大學讀三年，進大學之前的預科一至二年，預科之前還有高等學校四年，當時的高等學校教育品質非常高。臺北帝國大學創校之後，進行具有臺灣特色的昆蟲學研究、稻作學研究、氣象學研究、製糖化學研究，都取得可觀成就，奠定了臺灣近代學術的基礎。⁷從臺北帝大這個個案，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世界史上，侵略者或殖民者常常也扮演啟蒙

⁶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1964。中譯本：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林明德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19。此書有英譯本，見 Maruyama, Masao.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xpanded ed., edited by Ivan Morr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⁷ 歐素瑛：《臺北帝國大學與近代臺灣學術的奠定》，臺北：臺灣師大出版社，2020。

者的角色。

然而，當時臺籍菁英卻反對臺灣總督府創立臺北帝國大學，他們在《臺灣民報》發表文章，抗議總督府成立臺北帝國大學，是為了「內地人（日本人）本位教育」，而不是「臺灣人本位教育」。⁸1928年4月臺北帝國大學開學以後，文政學部招收17位學生，臺灣人只有3名；理農學科學生37名，臺籍學生也只有3名。對比當時臺灣人口的組成，在1915年臺灣戶口調查資料中，臺灣人的比例占臺灣總人口的95.57%，日本人僅占3.98%，⁹臺北帝國大學臺籍學生人數與人口結構不成比例，臺籍人士的抗議理由完全可以成立。臺北帝大不僅日本學生與臺灣學生不成比例，而且男女學生比例也極為懸殊，臺北帝大唯一臺籍正教授杜聰明（1893-1986）教授長女杜純淑就讀帝大英文科時，就是惟一的臺籍女生，她回憶求學時代說：「女學生在臺北帝大學生中屬於極少數，所以男學生對我們都很好奇，下課一直找機會講話，還不時尾隨女學生回家，我就有很多次被跟班的經驗。」¹⁰

臺北帝國大學創立以後，臺灣民間人士對帝國大學印象欠佳，著名作家吳濁流（1900-1976）用日文創作一本寫實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一直到戰後1956年才在東京以日文出版，隔一年改名為《被扭曲的島嶼》發行，後來才翻譯為中文《亞細亞的孤兒》。這本小說中的主角胡太明就是作者自己的投影，《亞細亞的孤兒》正是在日本帝國統治之下一個臺灣人的「苦悶的象徵」（厨川白村〔1880-1923〕語）。¹¹《亞細亞的孤兒》書中有一段文字描寫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臺北帝國大學是「豺狼大本營」：¹²

⁸ 〈臺灣大學の本體〉，《臺灣民報》，199號，昭和3年3月11日，第10版。

⁹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www.rchss.sinica.edu.tw/popu/index.php，1915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

¹⁰ 杜淑純：〈臺北帝大第一位臺灣女學生的回想〉，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51-72，引文見頁54。

¹¹ 厨川白村：《苦悶的象徵》，魯迅譯，第3版，臺北：五南出版社，2020。

¹²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臺北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265。

大明想起四、五天以前的報紙上，曾經發表過一篇臺灣大學總長和某教授關於「日語教育」的論文，該文指出：「為使臺灣人徹底『皇民化』，必須根本消滅臺灣語言。」這些『御用學者』公然發表這種謬論，已將他們諂媚當局政策的用心表露無遺，這樣一想，也許這就是把這地方稱為『豺狼大本營』的原因吧。」他還寫到「近年的官吏，大都由這所大學裡造就出來的，『皇民奉公會』的顧問，也是從這裏的教授中聘請的，這大學真不愧為促使合理榨取殖民地的精神武裝根據地。〔……〕這裏的學術精神早已滅亡，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為當局政策擔任開路工作；也就是掛了「學府」的招牌，以達成「思想侵略」的目的。

在吳濁流筆下的臺北帝國大學，是「促使合理榨取殖民地的精神武裝根據地」，民間觀感欠佳，反映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灣人的「臺灣意識」的形成與茁壯。當時許多優秀的臺籍子弟都到日本升學，例如光復之初接收臺大文政學部的林茂生（1887-1947），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後來留學美國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畢業於東京帝大的朱昭陽（1903-2002）在光復的時候，創立第一所臺灣人的大學——延平學院，可惜成立幾個月之後就發生 228 事件。在 228 事件後的歷史風暴中，延平學院停辦。¹³畢業於東京帝大、深受矢內原忠雄（1893-1961）器重的楊基銓（1918-2004），在 24 歲之齡出任宜蘭郡守，光復後在孫運璿（1913-2006）擔任閣揆的時代，曾任經濟部次長、農復會技正，他曾推薦李登輝（1923-2020）從合作金庫轉職農復會。¹⁴杜聰明（1893-1986）留學京都帝國大學，獲醫學博士後回臺灣任教於臺北帝大，成為臺北帝大唯一的臺籍正教授。

臺北帝國大學創校後到二戰結束，經歷過四個日本人總長。光復後接收臺

¹³ 朱昭陽口述：《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 83-90。

¹⁴ 楊基銓撰述：《楊基銓回憶錄》，林忠勝校閱，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 74-85。

北帝大的羅宗洛（1898-1978）校長（正式職稱是「代校長」，任期 1945.11.15-1946.06.30）撰有《接收臺灣大學日記》，在民國 34（1945）年 11 月 11 日的日記裡，羅宗洛寫道：「林熊祥偕其公子衡道（明篤）到，衡道出身東北帝大文法學部。言今後臺灣應著重民族性與創造性之發展，蓋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缺此二者故也。」¹⁵臺灣光復之初，民間人士民族情緒之高昂，由此可見一斑。同年 10 月 21 日，臺大醫學院的學生聯盟代表求見羅宗洛，要求全部解聘日籍老師，羅宗洛反對，他勸學生不可以一時感情而誤百年之大計。¹⁶

參、光復後臺灣大學改制

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派羅宗洛、陸志鴻（1897-1973）、馬廷英（1899-1979）等人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來到臺灣以後，羅宗洛再邀請臺北帝大惟一臺籍正教授杜聰明（1893-1986）加入，組成「大學校務維持會」，並由羅宗洛擔任主任委員，蘇步青（1902-2003）接收理學部、陸志鴻接收工學部、蔡邦華（1902-1983）接收農學部、杜聰明接收醫學部、林茂生接收文政學部。「大學校務維持會」於民國 34（1945）年 11 月 15 日，自前臺北帝國大學安藤一雄（1883-1973）總長手中接收官印、移交清冊，正式接收臺灣大學，日後即以此日為臺灣大學校慶

¹⁵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 34 年 11 月 11 日，載於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 224。關於光復初期臺大校內的民族情感與省籍問題，參看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第 6 章，頁 197-241。

¹⁶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 34 年 11 月 11 日，載於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 206；羅宗洛：〈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21 日，2 版。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 315 也強調：「故用之得其人，不必問其國籍」。

紀念日。¹⁷

接收之初，臺灣大學原擬更名為「國立臺北大學」。陳維昭（1939-）擔任校長時，民國 92（2003）年 1 月 7 日臺大第 2275 行政會議記錄中，報告事項就列入當時臺大發文詢問教育部有關臺大改名經過之紀錄，臺大請教育部根據檔案詳查之後確定，當時接收人員考慮將「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國立臺北大學」。雖然羅宗洛校長在當時的報紙上刊登招生廣告也有一度使用過「國立臺北大學」，但是不能確定臺大是否曾正式更名為「國立臺北大學」。經由臺大報請教育部查核舊檔案資料，確認當時接收小組以「國立臺北大學」之名報教育部，但當時在南京的行政院院會直接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原擬的「國立臺北大學」並未正式定名。¹⁸

民國 34（194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派來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人員，都是當時中國留學日本學者中之佼佼者。首任校長羅宗洛係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羅宗洛在日本從高等學校開始讀起，在日本留學 13 年。他完成博士學位以後第一篇論文，是用德文撰寫在德國發表，以後連續幾篇論文都是用英文撰文，在美國、歐洲發表。羅宗洛是中央研究院植物所創所所長，1945 年擔任臺灣教育特派員，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返回大陸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非常優秀傑出的學者。羅校長極具道德勇氣，民國 31（1942）年國民黨政府大肆逮捕浙江大學學生，羅宗洛挺立知識分子的風骨、譴責國民黨當局，聲援浙江大學，並要求釋放遭逮捕的學生。羅宗洛接收臺大之後，在《接收臺灣大

¹⁷ 關於羅宗洛接收經過以及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交涉，參看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第 1 章，頁 13-64。

¹⁸ 蔡玉玲記錄：〈臺大第 2275 行政會議記錄〉，《行政會議紀錄》，2003 年 1 月 7 日，sec.ntu.edu.tw/News_Content_n_897_s_26616.html。教育部以臺高（二）字第 0910192456 號函，檢附民國 34 年 12 月 25 日高字第 63242 號代電通知「臺北帝國大學經部提請行政院會議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已決議通過合電知照」，可見臺大係由「臺北帝國大學」直接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大學」並未正式定名。

學日記》記載：陳公洽（陳儀，1883-1950）到了臺灣以後控制臺灣所有稅收，不上繳中央，因此中央下令，臺灣省所有的官方支出，都由長官公署負責，其中包括臺灣大學經費。「陳公洽先生已決定大學校務維持會人選，以趙迺傳、范壽康、陸志鴻、馬廷英、杜聰明、林茂生及余七人為委員，以范壽康、杜聰明及余三人為常務委員，而由余主其事。」¹⁹羅宗洛當時建議請教育部長朱家驊（1893-1963）為正式校長，但國民政府擬派陳大齊（北大、北師大教授，1886-1983）為校長，可是陳大齊在 11 月 23 日回電羅宗洛，決定不就任。教育部只好請羅宗洛出任代理校長，民國 35 年《新生報》刊載臺灣大學公告，就以「代校長羅宗洛」具名。

1945 年臺灣光復，接收臺北帝大的時候，教授中日本人比臺灣人多，講師與新進聘用的教師中臺灣人比較多，日籍職員也比臺籍職員多，全校日本學生還是比中國學生多。²⁰這就是為什麼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學生群情激憤，民國 34（1945）年 10 月 21 日來見羅宗洛說：「一、為使臺灣教育徹底祖國化，應注意中國精神及國語之普及。二、日人及日籍教師應遣送回國，必須將日人之勢力一掃而光。三、缺乏技術人員及學術人才時，寧招聘歐美優秀人士，不用日人。四、如因日人之退出，而致大學之程度降低及產業停頓，學生等願負其責。」²¹羅宗洛回應學生說：日本人要不要遣返，應以其學術貢獻為考慮基準。例如農學院日籍教授磯永吉（1886-1972）改良了蓬萊米，對臺灣農業貢獻卓著，這樣的人才就應予留任。羅宗洛對部分傑出日籍教授的評價，也與當時學生的印象一致。1925 年生於臺北士林，而在 1945 年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地質系的王源，回憶他經歷從帝大到臺大的經驗說：「從臺大所留任的日籍教授們身上可以看出

¹⁹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 34 年 11 月 2 日，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 216-217。

²⁰ 〈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 151（表 1）、156（表 5）。

²¹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 34 年 10 月 21 日，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 205。

來，比從中國來的好很多」，²²他的觀察在地質學門大概與事實相去不遠。但是外文系的狀況就大不相同，齊邦媛（1924- ）在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隨馬廷英（1899-1979）教授來臺灣時，就說：「真正讓我留下來的，是到外文系看到一堆一堆的洋書」。²³羅宗洛在 1948 年 12 月 19 日致傅斯年函曾建議傅斯年接任校長後，「對臺灣人做事，第一要公平，第二要直捷，第三要堅決。應發脾氣時，可拍案怒罵，最忌游移不定、賞罰不明」，²⁴這項建議也正是羅宗洛接收臺大期間工作之原則。

臺灣大學的發展中有另一個關鍵，就是羅宗洛接受了原臺北帝大農學院院長奧田的建議，寫呈文給陳儀，《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 34 年 11 月 5 日中寫到：「起草呈二文。一呈陳長官，請將東京、京都、九州、北海道各帝國大學之演習林，交由臺北帝國大學接收管理，臺中州理番課牧場歸撥大學。」²⁵因此，日據時代日本各帝國大學在臺灣所設的「演習林（實驗林）」，全部撥歸臺灣大學接收管理，也正是因為這個轉折，所以光復後臺灣大學所管轄的土地面積占臺灣島百分之一。

第 2 任校長陸志鴻（1897-1973，任期 1946.8-1948.5）教授，是陳儀與南京國民政府共同可以接受的人選，也是從大陸來接收的委員之一。陸志鴻是東京帝國大學冶金科畢業，臺大第 1 任工學院院長。1923 年名列中國各種名人錄者，留日學生占 29.5%，陸志鴻是留日學生。²⁶第 3 任校長是福建泉州人莊長恭（1894-1962，任期 1948.6-1948.12.7），會講閩南話，係中央研究院第 1 屆院士，

²² 王源：〈我與臺大地質系〉，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 203-220。引文見頁 213。

²³ 齊邦媛：〈初見臺大〉，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引文頁 76。

²⁴ 羅宗洛：〈羅宗洛致傅斯年函〉，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引文見頁 325。

²⁵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 34 年 11 月 5 日，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 218。

²⁶ 關於陸志鴻任內之得失，同前註 17，第 2 章，頁 78-122。

學術成就很高。²⁷

第4任校長是傅斯年（1896-1950）（任期 1949.1.20-1950.12.20），在任期間1年11個月，²⁸傅斯年任內大幅改編臺大行政單位人員，有人根據民國41（1952）年的教職員錄，估計在傅斯年任內進入臺大行政單位的人員占78%。²⁹傅斯年在1948年將臺大醫學院「附屬」醫院，改名為「附設」醫院，³⁰使臺大醫院院長任命權回歸校長，更引爆校長與醫學院之緊張關係。傅斯年在1950年12月20日，在臺灣省參議會回答郭國基（1900-1970）參議員質詢後，回座坐在教育廳副廳長謝東閔（1908-2001）身旁，說“I am very tired”，隨即昏迷，終告不治。³¹傅斯年在臺大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逝世之後葬於校內「傅園」。³²傅斯年的教育理念與精神，在臺大留下深刻的痕跡，直至2018年的4月23日還在招喚著臺大師生。2018年反對民進黨政府拒聘臺大遴選的管中閔（民間俗稱「卡管」）的「黃絲帶臉書粉絲團」貼文說：「這所大學的精神奠定於傅斯年，紀念傅校長，傅校長的精神遺產第一個是『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傅

²⁷ 同前註17，第3章，頁123-134。

²⁸ 同前註17，第4章，頁135-166；劉廣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傅斯年校長與臺大〉，《傳鐘55響——傅斯年先生遺珍》，臺北：獨立作家，2015，頁65-98。

²⁹ 曾士榮：《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一九四五~五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dl.handle.net/11296/ene8e4，頁154。

³⁰ 〈國立臺灣大學3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中所載臺大醫院已稱為「附設醫院」，記錄原件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5樓特藏資源校史資料庫。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攝製：〈國立臺灣大學3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載於國立臺灣大學（編著），《國立臺灣大學校務會議記錄一覽》，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3。

³¹ 孫震：〈從傅斯年思想轉變看傳統儒學與現在社會〉，載於王志剛、馬亮寬（主編），《「傅斯年學術思想的傳統與現代」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頁11-18，頁11注2傅斯年說的話係孫震親聞謝東閔所述。

³² 臺大園藝系康有德教授曾回憶說：「至於傅園，原本是植物系的標本園，是錢思亮校長等人的主意將它改為紀念傅校長的墓園；沈剛伯先生可能也包括在內；植物系的李惠林教授還因此一氣之下就辭職去美國了」。見康有德：〈我與臺大園藝系〉，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引文見頁229。

斯年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不滿兩年，但是他在歷史上所留下的腳印如此深刻，至今還在召喚著臺灣大學的師生，反對掌握權力的人踐踏校園民主，批判政治髒手伸入大學校園。

第 5 任校長錢思亮（1908-1983，任期 1951.3-1970.6.1）任內平穩發展，多所建樹，李嗣涇前校長曾說：「錢校長身前身後最為人所稱道的，應是其穩重縝密的科學治事精神以及謙厚平和的待人態度〔……〕不但讓臺大躋身世界著名大學之林，也協助國內其他院校與國際教育界取得聯繫」。³³這是客觀公允的評論。

第 6 任校長閻振興（1912-2005，任期 1970.6.1-1981.7），閻校長被認為是當時蔣經國在高等教育界最器重的學者，但是任內在 1973 年發生臺大哲學系事件，該系教職員 13 人被解聘，是政治力干入校園事務之重要事件。此一事件是戒嚴時期（1949.5.19-1987.7.15）國民黨當局干預大學的嚴重事件，當時擔任臺大總教官的張德溥將軍（1970-1972 年任臺大軍訓總教官）在民國 83（1994）年 11 月 19 日，接受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訪談時，曾回憶蔣經國（1910-1988）找他說「臺灣所有學校我都可以控制，但是只有臺灣大學沒有辦法掌握。而臺大自由色彩太濃，軍人都沒有地位，你去呢希望能打開一個局面。」³⁴該事件調查小組在 1995 年 5 月 28 日完成並公開的報告中指出：「此一事件對臺灣大學造成第一次有教員大規模地非因學術或研究理由而去職，使政治干預校園

³³ 鄭吉雄編：《黨天事業成亮節：錢思亮校長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iii-ix。

³⁴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24。張德溥將軍對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談話內容，也見於後來他寫的回憶錄，參看張德溥：〈折戟沉沙（上）——張德溥將軍任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第 79 卷，第 6 期，（2001.12），頁 99-110；張德溥：〈折戟沉沙（下）——張德溥將軍任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第 90 卷，第 1 期，（2002.1），頁 101-114。張將軍是當時國軍傑出將領，調任臺大軍訓總教官期間，保護學生，呵護民主火苗，得罪當時的情治系統。

的事例在臺灣大學實現」，³⁵是公允的歷史判斷。

官派時期第 7 任校長是虞兆中（1915-2014，任期 1981.8.1-1984.7）校長，虞校長本來已經從臺灣大學工學院院長退休了，當時蔣經國指示總統府秘書長、中央黨部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與即將卸任的閻振興校長協商，討論臺大校長人選，決定請虞兆中回來接任校長，虞校長一上任就高喊「大學自治，學術自主」、「尊重學生的獨立人格」、「大學教育是一種品德教育」的口號，與戒嚴時代的政治氛圍格格不入，所以虞校長在回憶錄中曾回顧說：「我的任命出自政府的遴選。想來是他們觀察欠周，一年後發覺我的作為不符他們的希望，所以此後的兩年，有關方面是以極度的容忍，我才得任滿 3 年，再恢復退休。離職後我的處境因此也不難想像。」³⁶除了「大學自治」的提倡之外，虞校長從 1981 年 8 月開始在臺大推動通識教育，雖然受到當時國民黨當局的疑懼並橫加干擾，但是卻影響教育部在民國 73（1984）年 4 月 5 日以臺（73）高字第一一九八六號函檢送「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通知全國各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查照辦理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共 4 至 6 學分之課程。虞校長在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的貢獻影響深遠。³⁷

第 8 任校長是孫震（1934-），孫校長一共在任 9 年（1984-1993.2）。孫震校長任期內，臺灣適逢民主化運動快速茁壯，就像壓力鍋的鍋蓋一旦揭開，裡面滾燙的蒸氣立即釋放出來，戒嚴令廢除以後的臺灣，狂熱的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當時孫校長主持校務會議常常從早上九點開到下午六點半。在孫校長任內，1991 年臺大師生發起廢除《刑法》第 100 條的「100 行動聯盟」，孫校長處理穩當，但是引起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1919-2020）誤會，在立法院指責孫校長，孫校長遂辭去校長職務，孫校長說：「我做校長時，有一年，行政院郝院長對我

³⁵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231。

³⁶ 虞兆中：《臺大與我》，臺北：圖文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997，頁 10。

³⁷ 參看黃俊傑：〈虞兆中與大學通識教育〉，《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現況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3-20。

有所誤解，在立法院加以責備，引起軒然大波，我立即辭職抗議。就我所知，所有媒體都在支持我，記者朋友在我家門口日夜守候，識與不識的朋友的信如雪片飛來，給我鼓勵，給我出主意。郝院長第三天發現他資訊錯誤，就向我道歉，教育部不批准我的辭呈」，³⁸這是當時歷史實情。³⁹孫校長在 1993 年 3 月出任國防部長，校長職務由郭光雄教授代理（1993 年 3-6 月）。

自第 9 任陳維昭（1939-）校長（任期 1993.6.22-2005.6.21）開始，臺灣大學進入自主遴選校長時期，開啟臺大歷史新的一頁。雖然當時法律仍然規定國立大學校長由政府派任，但是臺大校務會議決議，經由民主程序自行推舉校長，首開國內各大學自行選薦校長之風氣。臺大此舉雖然激怒當時的教育部及國民黨政府，但政府最後選擇容忍，尊重大學自主。後來《大學法》修法，明定國立大學校長由校內組成遴選委員會，經遴選程序產生校長。因此，陳維昭校長成為第一位經由自主遴選產生的校長，遴選方式是經過遴選委員會的程序之後，由校務會議代表投票表決。

第 10 任李嗣涔（1952-，任期 2005.6.22-2013.6.21）任內正值教育部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05-2017），臺大經費充沛，研究與教學工作均有顯著發展，績效卓著，臺大教學水準之提升，允為典範。⁴⁰第 11 任是楊泮池（1954-，任期 2013.6.22-2017.6.21）校長，2015 年 1 月 7 日臺大與臺師大、臺科大簽約組成「國立臺灣大學聯盟」，三校結盟整合跨校資源，營造更佳的教學和研究環

³⁸ 孫震：《時還讀我書》，臺北：三民書局，2003，引文見頁 180；孫震：《寧靜致遠的舵手：孫震校長口述歷史》，黃羽婕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158。

³⁹ 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臺北：天下文化，2019，頁 396 說：「雙十節後一次立法院院會中，臺南一位王姓立法委員詢問情治人員進入校園強制驅離有無通知校長，我答復時對臺大校長加以指責，引發孫震表示要辭職，造成另一次風波。我為了緩和孫震的情緒，不得不放下身段親自拜訪他表示歉意，他也很誠意地打消了辭意。」

⁴⁰ 細節可參李嗣涔：《從追隨到領航：邁向頂尖的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境，促使學生跨校及跨領域學習。⁴¹楊泮池 4 年任滿後臺大進入代理校長時期，由張慶瑞（1957-，代理期間 2017.6-9）及郭大維（1964-，代理期間 2017.10-2019.1.8）代理校長。2018 年 1 月 15 日，臺大遴選管中閔（1956-）為第 12 任校長，民進黨政府教育部拒發聘書，拖延至 2019 年 1 月 8 日才發聘上任。⁴²管中閔就任校長後，提出「未來大學」的辦學願景，也開始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將學習主導權歸於學生，讓學生自主選擇學習方向，組合成需要的領域專長，超越就學年限與選課的傳統界線。第 13 任校長陳文章（1963-）在 2023 年 1 月 8 日上任，開啟臺大歷史新的篇章。

以上光復後的臺大校長，多數都堅守以「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為核心價值的「臺大精神」，其細節將於下文第 5 節詳加析論。

肆、臺大在發展過程中與政治力及經濟力的互動

臺灣大學與臺灣歷史的激盪，體現在與「政治力」及「經濟力」的激盪與互動之中。臺北帝大之創校，實為配合日本帝國南進政策，可以說臺北帝大自創立之初，就處在政治力的支配與滲透之下。臺北帝大創校總長幣原坦在創校前 5 年的 1923 年（大正 12 年）的《臺灣時報》，發表文章指出：「臺灣是日本帝國前進南洋之據點，在人文及自然科學研究上，均具有重大價值」，⁴³並指出

⁴¹ 楊校長任內各項工作，參看楊泮池：《傳承·創新·卓越：永遠的臺大人精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⁴² 關於事件經過細節，可參楊渡、管中閔：《大學的脊梁：臺大校長遴選事件與管中閔心情記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曾評論此書說：「《大學的脊梁》是本痛定思痛之書，也是一種傷痕文學。但它的意義不應局限為對某黨某派的控訴，而是提醒任何政權，任何為政者在權力與知識的場域上都可能面臨的考驗。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從教授到學生如何因應，尤為關鍵。」

⁴³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大正 12 [1923] 年 12 月號，頁 25-34。

創立臺北帝大就是為了完成這項政治目標。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也體現在臺大校園的造景當中，校園中所種植的兩排椰子樹並非臺灣原生物種，充滿了南洋意象，其用意或在於提醒當時師生「勿忘南洋」。日據時代政治力對臺北帝大之滲透，可見一斑。

政治力對臺大的支配和滲透，並沒有因為政權的轉換而改變。民國 34(1945)年臺灣光復，12月19日，羅宗洛就任臺大代理校長，極為重視文學院與法學院院長人選，「先後致電柳無忌及樓光來兩位先生，均未如願」，⁴⁴當時臺大的經費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付，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就企圖掌控臺大，要求指派文（朱光潛）、法（吳芷芳）兩學院院長。1945年11月28日，陳儀指示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1889-1979），⁴⁵致函羅宗洛云：「頃奉長官交下手條，為請吳芷芳為法學院長，未到派伍守恭代理一件。本擬趨教，適值事冗，不克分身，特以函奉，至祈察收辦理為荷。」⁴⁶羅宗洛校長回文云：「弟等奉命接收臺北帝大，幸叨福蔭，順利完成，此後應行興革事宜，亦勉竭駑鈍，盡力規劃。最近深感教部與公署雙方希望不甚一致，而公署對於大學之指導，亦間有異乎尋常者，弟等菲才，無法效勞。除電請教部派員接管外，敢請代向長官予以搭乘飛機之便利，俾得早日回都覆命。」⁴⁷陳儀看到羅宗洛校長的回復後，派人去飛機場勸他，當天羅宗洛校長剛好和長官公署財政廳長嚴家淦（1905-1993）搭乘同班飛機，嚴家淦與陳儀所派人員皆力挽羅宗洛校長留下，表示臺灣大學的經費三分之一明天馬上撥款，剩餘的部分下個禮拜立即撥下，但是羅宗洛拒絕接受，堅持回南京。陳儀及其所領導的派系對臺大校務常加干預，李東華教授

⁴⁴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編：《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史稿（1928-200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40。

⁴⁵ 葛敬恩是孫中山革命的時候之光復會、同盟會會員，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前進指揮所主任。

⁴⁶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34年11月28日，載於前註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233。

⁴⁷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民國34年11月28日，載於前註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233-234。

說：「自羅氏接收臺大初期，長官逕自決定臺大文、法兩學院院長人選，到公署謀自辦文、法學院，以及以經費問題刁難臺大等，決非出自陳儀一人之謀」，⁴⁸確係歷史實情。這個事件可視為「臺大精神」在羅宗洛校長身上的體現。

1949 年發生於臺灣的「四六事件」，是國共內戰以來最後一波學生被逮捕的學生運動，臺大與師大共有 21 名學生被逮捕。政治力的干涉從光復前到光復後從未間斷而且超越政權更迭，民國 62（1973）年臺大哲學系事件，教職員 13 人被解聘、臺大哲學系停止招生一年，直到民國 86（1997）年才獲平反。⁴⁹

1945 年臺灣光復後政治力對大學教育的干涉，同時也表現在必修科目與系所的設立之上，例如戰後國民黨政府所謂「部定共同必修科目」之實施（如「國父思想」、「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以及 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陳水扁主政的民進黨政府，在各大學運用政治力推動設立臺灣文史相關系所。當年在討論臺灣文學研究所的臺大校務會議門外，有人拉起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沒有設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的臺灣大學還是臺灣人的大學嗎？」這是赤裸裸的以政治力干涉學術的發展。2003 年，民進黨政府擬收回國立大學土地，當時政府的口號是：「國立大學的土地應與全民共享」，所謂「國立大學」主要指的就是臺灣大學，因為臺灣大學所管理的土地占臺灣島面積 1%，當時的臺大發表聲明，題為〈臺大的發展就是全民的發展〉，駁斥官方的訴求，此案最後由總統陳水扁以校友身份，寫了一封道歉函致臺大校長云：「相關人員或對本案有誤解之處，亦請代為說明是禱。耑此特復，並頌道安」，⁵⁰民進黨政府撤回收回臺大土地的原議。

2018 年 1 月起，民進黨政府拒絕發出臺大依《大學法》自主遴選之校長當選人聘書（民間稱為「卡管」），這是民主國家大學史上的首例。日本的《國立

⁴⁸ 同前註 17，引文見頁 62。

⁴⁹ 同前註 35。

⁵⁰ 陳水扁：〈陳總統水扁先生致函陳校長〉，《臺大校訊》，第 718 期，（2003.10.1）。

大學法人法》從 2003（平成 15）年生效實施後，86 所國立大學依法自主遴選的校長，至今無一人被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批駁。民進黨政府「卡管」以後，臺大師生發起連署，抗議政治力介入臺大，傷害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2018 年 4 月 30 日，中華民國史上任期最短的教育部長吳茂昆（任期 2018 年 4 月 19 日-2018 年 5 月 30 日）說：「遴選委員會是受校務會議委託，遴選委員會決定不再重啟，就請校務會議決定吧。」⁵¹5 月 12 日，臺大依教育部指示召開校務會議並決議：「大學校長之產生應屬大學自治的範圍。為維護學校之正常運作，教育部應依大學法等規定，處理本校之校長遴選結果，盡速發聘。必要時本校應依法尋求救濟。」⁵²這兩條歷史資料明白顯示官方對臺大肆行政治干涉，以及臺大對抗政治力干預的精神。

臺大創校 90 多年以來，衝擊著大學的另一股力量是「經濟力」，從臺北帝國大學開始，配合日本帝國南進政策，文政學部當時鑽研「南洋人文研究」，醫學部與農學部則加強「熱帶農業研究」、「熱帶醫學研究」（例如蛇毒研究）。1960 年代，臺大配合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化工系著重「應用化學」，以後加強化學工程。1974 年起，蔣經國（1910-1988）推動十大建設，臺大土木系分設「交通工程組」，化工、土木、機械設博士班，新設造船系所、資訊系。1980 年以後材料科學成為臺灣十大重點科技，臺大成立材料所碩博士班。1990 年代則有遷臺以後最大的國家級研究計劃「矽島計劃」（又稱「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矽導計畫」，實施日期是 2002 年至 2010 年），臺大增加電機系師資員額甚多。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推動第二期「邁頂計畫」（2011.4.1-2016.12.31），當時教育部向立法院宣稱，高等教育將配合重點服務業、六大新興產業、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專利產業化之需求。2014 年教育部推動「邁向頂尖大學

⁵¹ 中廣新聞網：〈遴委會無意重啟 吳茂昆：回歸校務會議〉，《Yahoo!新聞》，2018 年 4 月 30 日，reurl.cc/GErkRv。

⁵² 柯佳恩紀錄：〈國立臺灣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校務會議記錄》，2018 年 5 月 12 日，sec.ntu.edu.tw/administration_106-2-1-2minute.html。

計畫」(簡稱「邁頂計畫」)下獲得經費補助的各大學開會決議：「同意強化各校研究中心的前期產業連結及後端技術商品化機制，作為精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育部規畫後續相關政策的規劃方向」，⁵³上述發展都鮮明地反映出經濟力對大學教研工作之深刻滲透與主宰。2018 年開始，民進黨政府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強調大學與在地產業之連結，可見經濟力與政治力的干預，一直主導包括臺大在內所有大學的教研方向。

經濟力對大學的巨大影響，是 21 世紀世界各國大學教育共同面臨的新挑戰。進入 21 世紀以後，全世界大學教育的主要走向，就宏觀而言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就個人而言則致力於提升畢業生求職競爭力。我想以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 (UIUC) 為例說明這項教育趨勢。在 1961 年，伊利諾州州長發函 UIUC 校長，問及 UIUC 每年使用伊利諾州大量資金，學校對本州經濟有何貢獻？當時的 UIUC 校長耽擱了半年才回函，表示 UIUC 是世界頂尖大學，辦學目的並非為了配合本州經濟發展。但是到了 1999 年，伊利諾州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主席，寫了一封類似內容的信給當時的 UIUC 校長，引起全校震動，三個月之內，該校便設立負責產學合作的副校長職位，同年伊利諾大學向伊利諾州議會提出的年度報告，就訂名為：《伊利諾大學：經濟發展的引擎》(UIUC: Engin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⁵⁴ 1960 年至 1980 年的二十年間，美國大學學生人數大幅增加，正是曾任加州大學系統總校長柯爾 (Clark Kerr, 1911-2003) 所說的美國高等教育「大轉變」的二十年。⁵⁵但是，1990 年代以後，美國高等教育面臨歐盟與日本的經濟競爭，以及多極世界秩序的逐漸成形，而進入柯爾所謂的「不安的年代」。⁵⁶這是 UIUC 自稱為「經濟發展的引擎」的背景，在資

⁵³ 會議記錄全文見傅遠智紀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 14 次會議紀錄〉，2014 年 10 月 1 日，toptmu.tmu.edu.tw/files/news/6_b7686ca9.pdf。

⁵⁴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9.

⁵⁵ Kerr, C.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60-198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⁵⁶ Kerr, C. *Troubled Times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 1990s and Beyo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並參看拙書黃俊傑：《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

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美國，大學為經濟發展而服務，這是一個代表性的個案。

在亞洲，高等教育這種趨勢最嚴重的是日本，日本全國的大學共有 807 所，其中設有人文社會類科學研究的國立大學有 86 所。2015 年 6 月 8 日，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簡稱「文科省」）對設有人文社科系所的國立大學發出要求改革大學組織與業務的公文，特別指出為因應 18 歲人口的減少與育才的需要，並確保教育研究的水準，國立大學應改革或廢除人文社會科學舊有的組織，並向「社會需求較高的領域」發展。⁵⁷同年 7 月 23 日，隸屬日本總理府的「日本學術會議」發表措辭非常強烈的聲明，質疑文科省所要求的「組織廢除並向社會需求高的領域轉換」之教育政策，批評安倍政府目光短淺，難以培育具有全球化時代眼光的人才等等。2019 年 4 月 1 日起日本在全國各地創設「專門職大學」或「專門職短大」，由現有的大學或專門學校改制或新設，教育課程與產業界合作，學生畢業資格中有 30-40% 的學分必須到產業實習（4 年制大學學生則必須實習 600 小時以上），教員 40% 以上為具有業界實務經驗 5 年以上的業界人士出任（稱為「實務家教員」），反映日本的大學教育向求職導向傾斜的趨勢。哈佛大學的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的通識教育一向備受推崇，但曾任 Harvard College 院長的路易士（Harry R. Lewis, 1947-）教授撰有專書《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⁵⁸感嘆頂尖大學常常忘記教育的宗旨在於培育學生擁有是非判斷的能力。我們可以說包括臺灣大學在內，近 20 年來世界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也正是一種不同程度的「失去靈魂的卓越」。

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年初版 6 刷，頁 95-97。

⁵⁷ 參見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法人等の組織及び業務全般の見直しについて（通知）〉，2015 年 6 月 8 日，
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62/gijiroku/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16/1358924_3_1.pdf。

⁵⁸ Lewis, H.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 Public Affairs, 2007.

伍、什麼是「臺大精神」？

從歷史視野來看，從 1945 年臺灣光復以後臺灣大學所展現的所謂「臺大精神」，就是對教育主體性的追求。教育主體性的追求之所以如此彌足珍貴，其根本問題就是長久以來臺灣的「教育主體性的錯置」之問題，例如 1950 年代以降，臺灣的各級教育是為了政治主體而存在；1970 年代以降「經濟起飛」，教育為了經濟主體而存在；1980 年代以降在高科技發展大趨勢中，教育為了科技主體而存在。然而教育真正的目的，正如 20 世紀德國偉大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所說，在於「使人更能成為他自己」。⁵⁹《論語》首章〈學而〉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學而時習之」，第 5 世紀的皇侃（488-545）⁶⁰與第 10 世紀的邢昺（叔明，931-1010）⁶¹都引《白虎通》釋「學」為「覺」。13 世紀的錢時（子是，1175-1244）更進一步說：「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⁶²教育的目標就是使一個人覺醒而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為了經濟的崛起或科技的發展。正如傅斯年校長在臺大第 4 次校慶大會演講中說的：「辦教育，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與世界的文化。」⁶³

在戰後臺大發展史上，臺灣大學追求教育主體性而展現的「臺大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光復以來臺大堅持對抗政治力的不當干預。如羅宗洛代理校長拒絕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指派臺大文學院院長與法學院院長；傅斯年校長在軍警

⁵⁹ 雅斯培：《雅斯培論教育》，杜意風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5。

⁶⁰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義疏》，皇侃義疏，鮑廷博校，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知不足齋叢書本，1966，卷 1，頁 1-4。

⁶¹ 邢昺：《論語注疏》，臺北：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1966，卷 1，頁 1-2。

⁶²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69-70，卷 1，頁 1-2。

⁶³ 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臺大校訊》，第 45 期，（1949.11.21）。

逮捕共黨學生時，對當時警備總司令彭孟緝（1908-1997）提出三個條件：「第一、速辦速決；第二、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第三，被捕的臺大學生，先送法院，受冤者，儘快釋放。」⁶⁴錢思亮校長在國民黨情治單位壓力下，續聘殷海光（1919-1969）至 1969 年殷教授胃癌病故；虞兆中校長堅持推動通才教育，拒斥當時國民黨黨政干預；孫震校長在 1991 年 10 月 9 日臺大「一百行動聯盟」示威行動中與教育部約定：「臺大師生在臺大校園內靜坐由臺大負責。」1992 年 5 月 1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修正後加以下六字：「以強暴或脅迫」。⁶⁵

第二，「臺大精神」體現於維護教育場域的自主性。例如陳維昭校長拒絕陳水扁總統要求指派他的女婿的指導教授為臺大醫院院長。⁶⁶陳維昭校長任內某大資本家要捐鉅款，但附帶條件要求臺大管理學院更名，臺大行政會議討論後予以嚴正拒絕；錢思亮校長的兒女親家在教育部長卸任後想來臺大擔任教授，結果校聘審會投票未通過，錢思亮校長尊重「聘審會」（現稱「教評會」）的決議。2018 年 1 月「臺大人」約 4,000 人連署「抗議政治力介入臺大，堅守大學自主」。

所謂「卡管」案發生之後，2018 年 2 月 22 日，臺大前校長批判政治力之干預臺大自主，孫震前校長說：「校長遴選辦法是根據大學法依法辦理，1 月 5 日遴委會推選出新校長報到教育部，教育部直到現在還沒發聘，這麼簡單的一件事，為什麼國家不能處理？教育部這樣做，究竟是要打擊管中閔？還是臺大？還是臺灣高教？〔……〕教育部是在秉承上級命令嗎？是在執行上級意志嗎？」，

⁶⁴ 據傅斯年夫人所撰〈憶孟真〉文中引彭孟緝之言，見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 7 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頁 233-247，引文見頁 242。

⁶⁵ 關於「一百行動聯盟」示威以及孫校長處理經過，參看孫震：《寧靜致遠的舵手：孫震校長口述歷史》，黃羽婕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151-160。

⁶⁶ 陳維昭口述：《陳維昭回憶錄：在轉捩點上》，毛瓊英整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267-270。

⁶⁷陳維昭前校長說：「臺大從來沒有遭受過這樣的糟蹋。〔……〕現在是校園民主、學術自由最黑暗的時刻，令人痛心。」⁶⁸「請人事處同仁把這些教育部的公文、剪報，列入《臺大校史》，讓臺大人永遠記住這件事，這件事情將在臺大校史留下汙點，更是國際學術界非常重要的話題，國際研究學術自由的負面教材，會一輩子被討論。」⁶⁹「現在的教育部無能，令人無法理解，管太多，帶頭違法，不遵守規章制度，導致高教亂象百出，這是國家的悲哀、人民的不幸。〔……〕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臺大。」⁷⁰李嗣涔前校長質問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賴清德：「是否相信、認同依法行政是臺灣民主的價值嗎？大學自主也是臺灣價值嗎？如果你們認同，就請禁止教育部玩法弄權。」⁷¹這種維護教育主體性與教育場域自主性的精神，也體現在當時代理校長郭大維身上，郭代理校長數次請教育部依法行政，並在 2018 年 6 月畢業典禮致詞中說：「一個大學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諾貝爾獎、菲爾茲獎，一個大學最重要的在於要有令人傳頌的精神。」⁷²

以上臺大前校長在 2018 年對執政當局對臺大校長遴選案的打壓之批判，完全體現維護教育場域自主性的「臺大精神」，其中陳維昭前校長是 2017 年臺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召集人。2018 年 6 月 6 日下午 4 點，陳召集人應總統蔡英文之邀，與立法院王金平院長、總統府陳菊秘書長及蔡總統，在總統官邸面談臺大校長案一小時，陳維昭召集人對蔡總統開門見山說：⁷³

⁶⁷ 〈臺大前校長孫震：蔡英文當總統 做的事傷害很多人〉，《早報》，2018 年 2 月 22 日，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180222-837179。

⁶⁸ 杜憲昌：〈卡管 學術自由陷黑暗〉，《人間福報》，2018 年 2 月 23 日，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501116。

⁶⁹ 同前註 68。

⁷⁰ 同前註 68。

⁷¹ 同前註 68。

⁷² 〈2018 年畢業典禮 一所偉大的大學 郭大維代理校長致詞全文〉，《臺大校訊》，第 1353 期，2018 年 6 月 13 日，sec.ntu.edu.tw/epaper/article.asp?num=1353&sn=16276。

⁷³ 陳維昭：〈六月六日總統官邸談管案〉，《臺大校友雙月刊》，第 121 期，（2019.1.1），頁 4。

我認為這完全是一個政治事件，這種事件發生在這個年代很不可思議，而政府的操作手法又太粗糙，因而普遍引起反感，我認為不應為管案讓社會包括臺大，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應該想辦法盡快解決。

面對蔡總統要求臺大重啟遴選，陳召集人明確表示校長遴選委員會已經依照法律程序完成遴選出校長當選人並報教育部，依法不能重啟遴選，並對官方約談校長遴選委員表示抗議說：⁷⁴

遴選委員完全依法行事，卻遭到司法單位的約談，很多人都心存恐懼，更不可能在沒有法律依據之下重啟遴選，自陷困境。

這一段話言所當言，擲地有聲，陳召集人又總結此次在總統官邸面談的要點說：⁷⁵

我是期待蔡總統，不管原來的壓力來自哪裡，她應該可以出面協調解決。不過她的說法是她不能介入行政院的事務，而且兩件事的性質也不完全一樣。在這次會談中我想表達的意旨是：

一、遴選過程完全合法也合乎程序，沒有重啟遴選的理由和法源。

二、拔管事件的起因是因為教育部受到外來的壓力，不管它是政治壓力還是什麼壓力，解鈴還須繫鈴人，必須從壓力的由來去處理。

三、不管壓力來自那裡，蔡總統可以考慮以總統的高度出面協調解決。

四、不宜讓臺大乃至整體社會因管案繼續付出代價。

陳召集人不畏權勢，捍衛堅持「大學自主」的「臺大精神」，以上發言意旨既依法行事，又嚴拒政治力之干涉，是 70 多年來弘揚「臺大精神」的高峰，在

⁷⁴ 同前註 73，頁 5。

⁷⁵ 同前註 73，頁 6。

臺大校史上熠熠生輝。

這一種堅持「大學自主」的精神是臺大看不見的力量，也是世界一流大學共同分享的精神。2014 年臺大解聘 2 位學術表現不符規定的助理教授與副教授，被解聘者提起法律訴訟，歷經複雜訴訟過程，2022 年 7 月 29 日經由憲法法庭裁定臺大勝訴；⁷⁶2022 年 7 月至 8 月臺大國發所在職專班碩士、桃園市長以及桃園市長參選人被檢舉臺大碩士論文抄襲，臺大依法組成審定委員會，8 月 9 日公布審議結果，並撤銷兩人碩士學位，⁷⁷參選人退出選舉，教育部依監察院函發文，要求臺大課責抄襲論文之指導教授。這是臺大堅持「大學自治」的重要事件。

以上所說維護大學的自主性這個問題，最關鍵的是教育部與大學之關係，管中閔與孫效智撰文指出：「就大學具自治立法權而言，大學非教育部之下級機關；否則，教育部將有權干預大學自治規章之立法，這等於架空了大學的自治權。再就大學做為高等教育行政機關而言，大學亦非教育部之下級機關，因為大學在自治範圍內之行政權的權力根源與教育部有別，前者的權力根源為憲法所保障之大學自治制度，而教育部的權力根源則是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的行政院之組織。」⁷⁸，這一段文字可以視為臺大對這個問題最新的表述，確實點出維護大學自主性最核心的關鍵之所在。這段論述也與民國 84 (1995) 年 5 月 26 日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釋憲文之精神互相呼應。⁷⁹陳文政亦從法律立場指出

⁷⁶ 關於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書全文，詳見司法院：〈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憲法法庭》，2022 年 7 月 29 日，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97&id=309958&rn=-20949。

⁷⁷ 陳至中：〈臺大：林智堅論文抄襲情節嚴重 撤銷碩士學位〉，《中央通訊社》，2022 年 8 月 9 日，www.cna.com.tw/news/aip/202208095002.aspx。

⁷⁸ 管中閔、孫效智：〈管中閔·孫效智專文：大學自治與大學法修法芻議〉，《風傳媒》，2022 年 12 月 25 日，www.storm.mg/article/4670102?page=6。

⁷⁹ 釋字第 380 號（民國 84 年 5 月 26 日）釋憲文云：「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

「從現行規範架構可直接論證國立大學校長遴選應屬大學自治範疇；其次，校長實質選任應歸國立大學所有，法律僅授權教育部藉聘任形式對校長遴選程序進行『事後監督』」，⁸⁰這是在法律上可以成立的論點。

臺大維護教育主體性的第三方面在於：強調教育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以教育本身為目的，而非以教育為手段。羅宗洛校長在民國 34 年〈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一文中提出三點：⁸¹第一點，大學目標在追求真理，不可以臺灣之大學自居，應放大眼光，使臺大成為世界性之大學。第二點，大學並非政治行動之工具，不可以將大學置於政治控制之下。第三點，大學用人不宜存國別、種族、門閥、派別等之偏見。羅宗洛的說法正是世界頂尖大學用人的原則。傅斯年也說：「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⁸²傅斯年校長也規定當時臺大的大一國文讀《史記》與《孟子》。虞兆中校長在國民黨黨政壓力下，堅定地公告「通才教育課程科目」，推動「通才教育」。

以上所說體現「臺大精神」的 3 大方面：抗拒政治力的干預、維護教育的自主性，以及強調教育的「內在價值」，在現實上都很脆弱，時時面對來自大學外部與內部的挑戰。就外部的挑戰而言，政治權力至上主義、社會上瀰漫的功利主義教育觀等，都使臺大必須窮盡洪荒之力才能抵禦外部政治力的干涉，並維護大學自主之價值；就內部挑戰而言，大學內部的「客觀主義」思想主導大學的運作，臺大也像國內外許多大學一樣，大學治理重機制 (mechanism) 而輕

學術重要事項。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大學法未定有明文，然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民國 84 年 5 月 26 日）釋憲文，《司法院公報》，第 37 卷，第 6 期，6-14 頁。

⁸⁰ 陳文政：〈大學自治與國家監督——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爭議之法理分析〉，《政大法律評論》，第 159 期，（2019.12），頁 1-67，引文見頁 3。

⁸¹ 羅宗洛：〈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21 日，2 版。載於前註 15《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頁 313-316。

⁸² 同前註 63。

氛圍，大學的運作邏輯也極端重視「可操作性」，而忽視「不可操作性」之指標（如校園文化），所以，所謂「臺大精神」呵護不易。再就臺大內部的挑戰而言，臺大內部「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教育觀氛圍甚囂塵上，有些人將教育視為工具，特別強調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所謂「基本能力」特指蒐集及運用資料的「工具性技能」，作為求職之準備。最鮮明的證據就是 2014 學年度起，臺大所實施的充抵通識學分的「基本能力」課程，要求學生修習有關「工具性技能」的「基本能力」課程 6 學分。這項「工具性技能」的「基本能力」課程的選修規定，雖然反映的是 2014 學年度當時臺大少數主管的大學教育觀，但是至今仍是臺大學生「通識修習規範」，⁸³這樣的修課規定反映近 20 年來逐漸形成風潮的「工具論」的大學教育觀，⁸⁴與光復初期傅斯年揭櫫的「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之精神」的理念，重視通識教育的精神，⁸⁵與民國 7（1918）年 12 月 10 日蔡元培（1868-1940）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所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的大學理念完全背反，也與傅斯年在第 4 次校慶演說所說：「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⁸⁶相去不啻萬里，而且對二戰結束至今 70 多年來所形塑的所謂「臺大精神」，從大學內部造成相當的傷害。孫震前校長曾經感嘆「教育知識化」與「知識商品化」的教育趨勢，⁸⁷2014 年度起臺大以「工

⁸³ 見《臺灣大學新生通識修習規臺灣大學新生通識修習規範》，nol.ntu.edu.tw/nol/note/105-2/fresh.htm。臺大通識教育所經歷的改變，曾引起許多學者的批判，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編：《通識在線》，第 69 期，（2017.3）。曾刊出臺大前教務長莊榮輝等 6 人之文章，以及時任臺大副教務康仕仲的回應，見該期刊頁 7-27。

⁸⁴ 但是盱衡各國頂尖大學的教育理念，仍以「非工具論」居於主流之地位，我曾討論這個問題，參見黃俊傑：〈21 世紀大學理念的激盪與通識教育的展望〉，《通識教育學刊》，第 20 期，（2017.12），頁 11-38。華藝，[doi.org/10.6360/TJGE.201712_\(20\).0001](https://doi.org/10.6360/TJGE.201712_(20).0001)。

⁸⁵ 參看劉廣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傅斯年校長與臺大〉，《傳鐘 55 響——傅斯年先生遺珍》，臺北：獨立作家，2015，頁 27-40。

⁸⁶ 同前註 63，原刊於《臺大校訊》第 45 期，載於傅斯年：《臺灣大學辦學理念與策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85-92，引文見頁 86。

⁸⁷ 同前註 65，頁 201-202。

具性技能」為「基本能力」的「通識修習規範」，正是這種趨勢最鮮明的表現。

「工具性技能」在現代社會中非常重要，包括臺大歷任校長在內的學者，並不是反對「工具性技能」的學習，也不是反對技職教育，他們不能贊成的是以「工具性技能」學分充抵通識教育學分這項政策，對大學理念所造成的傷害。

光復後臺大追求教育主體性的精神，建立在「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的堅持之上，這是民國以來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創黨人之一陳獨秀（1879-1942）說：「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⁸⁸民國時代儒學大師馬一浮（1883-1967），在抗戰時期的四川辦復性書院，弘揚六藝之學，轟動全國，1940年蔣中正委員長指示教育部長陳立夫（1900-2001）撥款資助，但教育部要求提報師資及課程供審查，馬一浮堅持學術獨立，拒絕接受教育部審查和指導，馬先生致教育部函云：「以云考核，當以俟之程朱；若有懷疑，惟是折衷孔孟。」⁸⁹胡適（1891-1962）在1947年9月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主張「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最大的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心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⁹⁰當時胡適所說的「學術獨立」是指爭取本國學術相對外國學術而言的獨立，但其背後也潛藏著學術領域相對於政治領域而言的獨立。

從民國以來教育界所追求的學術獨立，直到民主化以後的臺灣才在《大學法》（民國37〔1948〕年1月12日公布，歷經修正，最近一次在民國108〔2019〕年12月11日修正）中體現。1994年《大學法》修訂，規定公立大學校長由官派改為自主遴選。《大學法》第1條第2款：「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及第9條：「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

⁸⁸ 陳獨秀：《陳獨秀文存》，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頁110。

⁸⁹ 馬一浮：《書札》卷2，載於吳光編《馬一浮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2冊（下），頁534。

⁹⁰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9冊，1958年3月26日，頁344。

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大學法》明確指出教育部對國立大學校長只有「聘任權」沒有「准駁權」，2018年教育部擴大解釋將國立大學校長視為教育部聘任之員工，已經完全背離《大學法》第1條及第9條所揭櫫學術獨立與大學自主的原則。2018年6月10日，當時臺大代理校長郭大維在臺大畢業典禮，以〈一所偉大的大學〉為題致詞說：「臺灣大學深信大學自治的重要，我們會繼續堅持民主法治、教育政治分離的重要，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一所偉大的大學應該要有令人傳頌的精神，她應該是危機發生時，社會引領期盼的大學，我們所有師生是塑造這個精神的本體」，⁹¹正是體現臺大對大學自主的堅持。

從世界的大學發展史來看，「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二者實有其不可分割性，又具有相互緊張性。美國學者 Byron K. Marshall 的研究指出：1904-1905 日俄戰爭期間，東京帝國大學堅持「學術獨立」，所以校長（日本的帝國大學校長正式職稱是「總長」）與教授聯合反對日本政府在中國東三省的軍事冒進，但是到了 1939 年，當時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1893-1961）卻因反戰言論而被逼辭職。⁹²Marshall 解釋這種發展說，因為大學經 30 餘年發展已獲「學術獨立」，所以大學當局可以以犧牲「學術自由」之手段，換取軍方對大學之不干涉。⁹³從具體的歷史個案來看，「學術獨立」必須加以珍惜，確實隨時會失去，而所謂「學術自由」更需要進一步分析。從美國的大學發展史來看，美國的大學「學術自由」也是經過長達 300 年的奮鬥才獲得。從 1636 年哈

⁹¹ 同前註 72。

⁹² 矢內原忠雄在昭和 12 年（1937 年）9 月號《中央公論》雜誌，發表題為〈國家的理想〉的論文，被東大經濟學部長在經濟學部教授會中提案認為論文甚不穩當，提案獲過半數教授同意，矢內原忠雄自行辭去教授職務。參看矢內原忠雄：〈大學辭職の日〉，載於矢內原忠雄，《私の歩んできた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頁 99-103。

⁹³ Marshall, B. K.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62-189。

佛大學創校之後，直到南北戰爭（1861-1865）結束，美國的學院都籠罩在宗教權威的支配之下，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對宗教權威產生激烈的衝擊，研究美國思想史的歷史學家指出：在 19 世紀末的美國，許多人的基督宗教信仰頗受達爾文的演化論之撼動，造成美國史上所謂「鍍金年代中的精神危機」，⁹⁴宗教對大學的支配才逐漸減低。1915 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創立之後，大力協助各大學爭取「學術自由」，產生重大的影響。⁹⁵

我想再就「學術自由」中的「自由」一詞進一步闡釋。20 世紀自由主義大師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在 1958 牛津大學講座教授就職演說中，曾將「自由」分析為「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積極的自由」以「自作主宰」為核心，可理解為“Freedom of”，如講學的自由、思考的自由。「積極的自由」還可以延伸至「自由」與「秩序」（法治）的關係中思考，例如籃球比賽中球員可以「自由」地展現他們的才華，但是這種「自由」實建立在兩隊球員都遵守球賽規則（秩序）之中，所以「自由」與「秩序」密不可分。柏林所提出「消極的自由」（“Freedom from”）一詞，所思考的是「在什麼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別人的干涉？」這個問題，特重個體之免於被政治化，免於被化約為工具（如君子不器）。在柏林的論述中，「消極的自由」是「積極的自由」的強有力的保障。⁹⁶在大學爭取「學術自由」的過程中，制度性的對「自由」的保障極為重要，大學自主遴選校長就是這種制度性保障的一部分。

⁹⁴ 參考 Carter, P. A.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Gilded Age*.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⁹⁵ Metzger, W. P.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此書有中譯本：沃特·梅茲格：《美國大學時代的學術自由》，李子江、羅慧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⁹⁶ Berlin, I.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repr. 1977, pp. 118-172；中譯本：Isaiah Berlin：《自由四論》，陳曉林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229-246。

陸、結論

今天的臺灣大學處於戰後世界高等教育的「量的變化」與「質的變化」的脈絡之中。1950 年，全世界共有 3,500 所大學，學生共 660 萬人，到了 2000 年，全世界共有 3 萬所大學，學生 8,050 萬人。美國共有 4,726 所大學院校，大陸高校共 2,914 所。截至 2022 年教育部的統計，臺灣共有 158 所大學院校（含專科、空大及軍警院校），數量快速擴張。戰後世界高等教育向「就業導向」傾斜，1960 至 1980 年之間美國的大學之工程與管理學院快速發展。⁹⁷戰後世界大學教育的變化，體現在高等教育的大眾化（massification），極端氣候與環境巨變、大學內部各學門日趨專業化，學門之間互為疏離，高新科技的突飛猛進，大學治理中的「公司文化」日益顯著，⁹⁸使「學術資本主義」⁹⁹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界的新現象，頂尖大學中掌握可快速「商品化」之高新科技知識的學者，與掌握國家機器的政治人物以及大資本家，已然形成 21 世紀共犯結構。但是社會也要求大學必須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¹⁰⁰所以，21 世紀的大學如何在政治權力與資本主義的拉鋸之間，堅持教育主體性就更加重要。

1945 年臺灣光復以後，臺大在政治力與社會經濟力的激流中堅持教育主體性，就如同在臺灣東部花蓮秀姑巒溪操舟前進，在驚濤駭浪中必須心定神寧。臺大羅宗洛代理校長在 1945 年 11 月 28 日力抗陳儀指派臺大法學院長，並堅

⁹⁷ 同前註 55, pp. xii-xiii。

⁹⁸ Gould, E. *The University in a Corporate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⁹⁹ Slaughter, S., and Leslie, L. L.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⁰⁰ Bok, D.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此書有中譯本：〔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徐小洲、陳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但中譯本刪除英文原書之部分文字。

持「不可以將大學置於政治控制之下」；¹⁰¹虞兆中前校長拒絕國民黨當局干預，堅持推動通識教育課程；陳維昭前校長拒絕時任總統陳水扁指示臺大醫院院長人選，以及 2018 年「卡管」過程中，臺大堅持依法辦理，堅持「大學自主」，都是「臺大精神」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

大學在 21 世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正如在 1988-96 年擔任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長的 James J. Duderstadt 所說：「大學教育的價值從沒有今天這樣高」。¹⁰²在 2000 年與 2008 年總統大選後政黨輪替之際，臺大均辦理「臺大對新政府的期許」學術研討會，由校內各學術專業領域教授發表關於新政府應興應革之事的論文，並由校長總結報告，善盡智識份子的言責，當時即將就任的總統當選人都坐在臺下，聆聽臺大校長的總結報告，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臺大堅持傳統的「道高於勢」理念的表現。2000 年與 2008 年的臺大自我期許作政府的諍友，不作掌權者的弄臣。在大學教育的內容快速邁向「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市場化」的 21 世紀，國內外大學日益重視有形的、直接的、現在的價值，而日益輕視不可見的、間接的、未來的價值，大學校長以募款為最重要之職責，大學專業中最能創造收入的科系就成為熱門科系，捐款最多的大資本家常獲各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在這種大學教育背景之中，本文所謂「臺大精神」雖然只是一種看不見的校園氛圍、一種不能以量化工具加以測度的大學教育價值觀，或只是一種很容易被政治力與經濟力扭曲的脆弱的師生共識，但是卻彌足珍貴，亟待細心守護。在「學術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 21 世紀裡，70 幾年來臺大師生所形塑的「臺大精神」如果能夠繼續弘揚，也許就可以擎起華人地區高等教育的火炬。

¹⁰¹ 同前註 81，頁 313-316。

¹⁰² Duderstadt, J. J. *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reface”；中譯本見：James J. Duderstadt：《21 世紀的大學教育》，劉彤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一、中文文獻

〈臺灣大學的本體〉，《臺灣民報》，199 號，昭和 3 年 3 月 11 日，第 10 版。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徐小洲、陳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Isaiah Berlin：《自由四論》，陳曉林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James J. Duderstadt：《21 世紀的大學教育》，劉彤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来社，1964。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林明德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編：《通識在線》，第 69 期，（2017.3）。

王源：〈我與臺大地質系〉，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 203-220。

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民國 84 年 5 月 26 日）釋憲文，《司法院公報》，第 37 卷，第 6 期，6-14 頁。

矢內原忠雄：〈大学辞職の日〉，載於矢內原忠雄，《私の歩んできた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頁 99-103。

朱昭陽口述：《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何晏集解：《論語集解義疏》，皇侃義疏，鮑廷博校，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知不足齋叢書本，1966。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臺北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

李東華、楊宗霖編校：《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李嗣涔：《從追隨到領航：邁向頂尖的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杜淑純：〈臺北帝大第一位臺灣女學生的回想〉，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 51-72。

沃特·梅茲格：《美國大學時代的學術自由》，李子江、羅慧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邢昺：《論語注疏》，臺北：中華書局據阮刻本校刊，1966。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洪金珠、許佩賢譯，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1994。

孫震：〈從傅斯年思想轉變看傳統儒學與現在社會〉，載於王志剛、馬亮寬（主編），《「傅斯年學術思想的傳統與現代」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頁 11-18。

孫震：《時還讀我書》，臺北：三民書局，2003。

孫震：《寧靜致遠的舵手：孫震校長口述歷史》，黃羽婕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臺北：天下文化，2019。

馬一浮：《書札》卷 2，載於吳光編《馬一浮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 2 冊（下），頁 534。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編：《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史稿（1928-2008）》，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攝製：〈國立臺灣大學 3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載於國立臺灣大學（編著），《國立臺灣大學校務會議記錄一覽》，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3。

康有德：〈我與臺大園藝系〉，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 221-242。

張德溥：〈折戟沉沙（上）——張德溥將軍任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第 79 卷，第 6 期，（2001.12）。

張德溥：〈折戟沉沙（下）——張德溥將軍任臺大軍訓總教官歲月的回憶節錄〉，《傳記文學》，第 90 卷，第 1 期，（2002.1）。

陳文政：〈大學自治與國家監督——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爭議之法理分析〉，《政大法學評論》，第 159 期，（2019.12.），頁 1-67。

陳水扁：〈陳總統水扁先生致函陳校長〉，《臺大校訊》，第 718 期，（2003.10.1）。

陳維昭：〈六月六日總統官邸談管案〉，《臺大校友雙月刊》，第 121 期，（2019.1.1），頁 4-6。

陳維昭口述：《陳維昭回憶錄：在轉捩點上》，毛瓊英整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陳獨秀：《陳獨秀文存》，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

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臺大校訊》，第 45 期，（1949.11.21）。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 7 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傅斯年：《臺灣大學辦學理念與策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厨川白村：《苦悶的象徵》，魯迅譯，第 3 版，臺北：五南出版社，2020。

曾士榮：《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一九四五~五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dl.handle.net/11296/enc8e4。

雅斯培：《雅斯培論教育》，杜意風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黃俊傑：〈21 世紀大學理念的激盪與通識教育的展望〉，《通識教育學刊》，第 20 期，(2017.12)，頁 11-38。華藝，doi.org/10.6360/TJGE.201712_(20).0001。

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99-124。

黃俊傑：〈孫中山思想及其 21 世紀的新意義與新啟示〉，《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179-201。

黃俊傑：〈虞兆中與大學通識教育〉，《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現況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3-20。

黃俊傑：《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年初版 6 刷。

楊泮池：《傳承・創新・卓越：永遠的臺大人精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楊基銓撰述：《楊基銓回憶錄》，林忠勝校閱，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

楊渡、管中閔：《大學的脊梁：臺大校長遴選事件與管中閔心情記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

虞兆中：《臺大與我》，臺北：圖文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997。

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大正 12 [1923] 年 12 月號，頁 25-34。

幣原坦：《韓國政爭志》，東京：三省堂，1907。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齊邦媛：〈初見臺大〉，載於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 73-86。

劉廣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傅斯年校長與臺大〉，《傳鐘 55 響——傅斯年先生遺珍》，臺北：獨立作家，2015，頁 65-98。

歐素瑛：《臺北帝國大學與近代臺灣學術的奠定》，臺北：臺灣師大出版社，2020。

鄭吉雄編：《薰天事業成亮節：錢思亮校長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錢時：《融堂四書管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1969-70。

羅宗洛：〈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21 日，2 版。

二、外文文獻

Berlin, I.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repr. 1977.

Bok, D.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arter, P. A.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Gilded Age*.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Duderstadt, J. J. *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Gould, E. *The University in a Corporate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uang, C. C. “Dr. Sun Yat-sen’s Pan-Asianism Revisite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3, 2012, pp. 69-74. www.sciea.org/data-j03/06_Note_Chun-chieh%20Huang.pdf.

Huang, C. C.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 pp. 111-127.

Kerr, C.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60-198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Kerr, C. *Troubled Times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 1990s and Beyo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Lewis, H.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 Public Affairs, 2007.

Marshall, B. K.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Maruyama, Masao.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xpanded ed., edited by Ivan Morr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Metzger, W. P.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Slaughter, S., and Leslie, L. L.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9.

三、網路資源

〈2018 年畢業典禮 一所偉大的大學 郭大維代理校長致詞全文〉，《臺大校訊》，第 1353 期，2018 年 6 月 13 日，
sec.ntu.edu.tw/epaper/article.asp?num=1353&sn=16276。

〈臺大前校長孫震：蔡英文當總統 做的事傷害很多人〉，《早報》，2018 年 2 月 22 日，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180222-837179。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www.rchss.sinica.edu.tw/popu/index.php。

《臺灣大學新生通識修習規 臺灣大學新生通識修習規範》，
nol.ntu.edu.tw/nol/note/105-2/fresh.htm。

中廣新聞網：〈遴委會無意重啟 吳茂昆：回歸校務會議〉，《中廣新聞網 yahoo!新聞》，2018 年 4 月 30 日，reurl.cc/GErkRv。

文部科學省：〈国立大学法人等の組織及び業務全般の見直しについて(通知)〉，2015 年 6 月 8 日，
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62/gijiroku/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16/1358924_3_1.pdf。

司法院：〈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憲法法庭》，2022 年 7 月 29 日，
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97&id=309958&rn=-20949。

杜憲昌：〈卡管 學術自由陷黑暗〉，《人間福報》，2018 年 2 月 23 日，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501116。

柯佳恩紀錄：〈國立臺灣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臺灣大學秘書室《校務會議記錄》，2018 年 5 月 12 日，
sec.ntu.edu.tw/administration_106-2-1-2minute.html。

陳至中：〈臺大：林智堅論文抄襲情節嚴重 撤銷碩士學位〉，《中央通訊社》，2022 年 8 月 9 日，www.cna.com.tw/news/aip/202208095002.aspx。

傅遠智紀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 14 次會議紀錄〉，2014 年 10 月 1 日，
toptmu.tmu.edu.tw/files/news/6_b7686ca9.pdf。

管中閔、孫效智：〈管中閔・孫效智專文：大學自治與大學法修法芻議〉，《風傳媒》，2022 年 12 月 25 日，www.storm.mg/article/4670102?page=6。

蔡玉玲紀錄：〈臺大第 2275 行政會議記錄〉，《行政會議記錄》，2003 年 1 月 7 日，
sec.ntu.edu.tw/News_Content_n_897_s_26616.html。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ince 1945 and analyzes the so-call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which includes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conomic view,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and worldview. All of these ideas constitute a complex cluster of ideas in the evolving of that Spirit. I indicate that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evolves in the university’s constant intera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since 1945. It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a) resistance against political interference, (b) striving for autonomy of education, and (c) stress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education. I also argue that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is only made possible on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upholding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academic freedom” which had been aspired by intellectuals and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 greater China. This “Spirit” has been acquired painfull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postwar Taiwan. However, this “Spirit” has confronted constantly with challenges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NTU campu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moving toward the quantification, standard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knowledge.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been devoting tremendous attention to the concrete, direct and present valu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visible, indirect and future values.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as an invisible ambience in the campus and a fragile consensus of value among students and faculty, carrie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to higher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as a whole.

Keywords: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the subjectivity of education, academic independence, academic freedom

Extended Abstract

The first section addresses two questions to be tackled within this article, namely: (a) How has Taiwan University interacted with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power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28, especially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 How is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itself manif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University?

The second section unveil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pertaining to the founding

in 1928 of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臺北帝國大學), which was renam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1945. In a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aiwan may be metaphorized as a symphony and a palimpsest. The cession of Taiwan to the Japanese Empire in 1895 resulted in the rupture of Taiwanese identity. 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Taiwan has come to resemble a noisy and discordant symphony. Moreover, Taiwan may also be metaphorized as a palimpsest. Throughout Taiwan’s long history of domination under successive ruling authorities, the Dutch (1624–1662), Koxinga (1661-1683), Manchu (1683–1895), Japanese (1895–1945)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5–present) each wielded an enormous eraser to wipe out the footprints left by their preceding regime. However, traces of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ymbols of the predecessor were always left behind. Therefore, Taiwan cannot but have become a palimpsest.

Thre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1920s when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founded can readily be observed. First, Taiwanese experienced drastic change in their identity.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s opposed to the Japanese became evident. Secondly, the 1920s was a decade of upheaval and turmoil in East Asia. In sync 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witnessed the rise of military power and fascism while China suffered from internecine warfare among the warlords. Thirdly, the 1920s was an era of turbulence and disorder in America and Europe. The rise of fascism in Ita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SSR,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USA signified the sea changes in world history.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the age of thunder and storm. The second and third sections of this article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he colonial day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since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o the ROC government in 1945.

The fourth section of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TU and the successive political as well as economic forces ruling Taiwa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aiwan University. As early as its inception in 1928 in the colonial days, the University could not avoid being deeply infiltrated and dominated by the imperial rulers. In fact,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to support the Japanese Empire’s invas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its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re.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remained unchanged with the change-over of administr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As early as in 1945, the then Taiw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Governor Chen Yi (陳儀, 1883-1950) ordered the then acting president of NTU Lo Zonglo (羅宗洛, 1898-1978) to appoint two scholars he designated as the Deans of the Colleges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This rud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with NTU's academic autonomy resulted in President Lo's refutation and resignation.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retrocession,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had designated ideological courses such as "Dr. Sun Yatsen's Thought" an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s nationally required courses. After the change-over of administration in 2000, the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government strived to set up departments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many universities including NTU. In 2003, the DPP government wanted to retrieve the land administered by NTU. This political action resulted in backlash from NTU and eventually the DPP government abandoned that order. The most striking event of KMT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t NTU was the "Incident of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NTU" in 1973. That incident resulted in the firing of thirteen faculty members and staff "for non-academic reasons [...]" and manifested th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on the campus."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interference, NTU has suffered from the domination of economic power. In sync with Taiwan's economic boom since 1960s, NTU has created many new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units to support the KMT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The fifth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on three counts. Coming under constant political interference from the ruling party, be it the KMT or the DPP, many NTU presidents have resisted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second constituent unit-idea of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lies in a strong belief i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vent illustrating this was the DPP government's refusal to approve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ho was elected in 2018 by the NTU Presidential Search Committee organ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ity Act. The DPP government's refusal to ac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Act incurred the wrath of NTU administrators, faculty members, students, and alumni worldwide. After numerous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the DPP government sanctioned the case toward the end of 2018. The case of the 2018 NTU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vealed vividly NTU's insistence on upholding the doctrine of the autonomy of the university.

The third unit-idea of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lies in NTU's insistence o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education. As early as in 1945, the then President Lo Zonglu powerfully proclaimed that the university is not the tool of political action. Lo insi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must not be put under political control. Fu Sinien (傅斯年, 1896 –

1950) held that there was no room for instrumentalism at NTU. Yu Zhauzhong (虞兆中, 1915 – 2014) strived to promote general education while fighting against the KMT’s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ll of these historical facts exhibit NTU’s insistence o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ollege education worldwide has been pushed by capit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quickly towards the quantification, standard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knowledge. Al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been devoting tremendous attention to concrete, direct, and present value at the expense of abstract, indirect, and future value. Against the abov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Spirit of Taiwan University,” as an invisible ambience of the campus and a fragile consensus of value among students and faculty, must be treasured carefull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stressing that this “Spirit,” although it cannot be measured quantitatively, is the cornerstone that makes the university a true un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hen “academic capitalism” is prevailing.